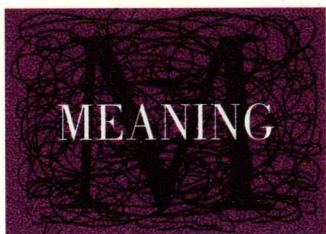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哲学理论与实践书系



[美]杰罗姆·布鲁纳 / 著
魏志敏 / 译

有意义的行为

Acts of Meaning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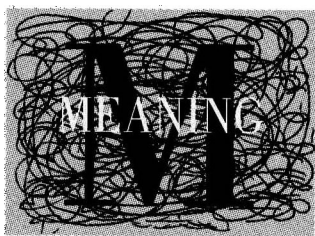
人文译丛
总主编 ◆ 何怀宏

西方哲学理论与实践书系

[美]杰罗姆·布鲁纳 = 著 魏志敏 = 译

有意义的行为

Acts of Meaning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意义的行为 / (美) 布鲁纳著; 魏志敏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8.12

(人文译丛)

书名原文: Acts of Meaning

ISBN 978-7-206-05849-3

I. 有… II. ①布… ②魏… III. 意义理论—研究 IV. B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6423 号

有意义的行为

著 者:[美]布鲁纳

译 者:魏志敏

责任编辑:郭 威

封面设计: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网 址:www.jlp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431-85395845 85395821

印 刷: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4.75 字数:1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849-3

版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书籍就像突出海平面的山峰，尽管它们看起来像是孤零零的岛屿，但它们意味着一块新大陆就要出现在面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是某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课题的一部分。而它们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是一片广袤的知识大陆的一部分。本书也不例外。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心理学——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称之为关于心智的科学——正处于其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时期。它丧失了自己的核心，并且面临失去维系其内在交流所必需的凝聚力的危险，而只有这样的交流才能确保心理学各部分之间合理分工。心理学的各部分都有自己的组织实体、理论架构，通常还有自己的期刊，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各自成果的可交流性愈来愈差。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将自己封闭在自身的学术体系中和学术权威的领地之内，这种自我封闭使各部分（心理学越来越像是一个由零散的各个部分拼凑在一起的整体）与其他领域的探索距离越来越远，而这些探索旨在把握人的心智和人类的处境——对人性的探索或对其他社会科学的探索。

过去的一切可能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或许还折射出一次“角

有意义的行为

度转换”，这在人文科学领域中是必要的。“生物学”层面的心理学摒弃了自己的古老基础而加入了神经科学，新兴的“认知科学”则吸收了过去属于感知、记忆、思维等领域的很多东西，而现在这些领域被认为是“信息处理”的分支。这些新组合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们可能给旨在剖析人类的研究工作带来新的、出人意料的理论力量。

尽管分裂和条块分割似乎在所难免，但我认为心理学不会因此走向毁灭，也不会注定永远分裂下去。心理学当初是一个整体，虽然后来“共同”探讨的问题分裂为一系列彼此独立的部分，但其主要问题仍然具有活力。冯特（Wundt）于1879年在莱比锡创立的心理实验室并没有取消这些问题，只是给它们披上了一件新外衣，这种“新式”的实证主义风格颇受19世纪晚期心理学前辈的青睐。即使是冯特，在其晚年也意识到新的“实验”风格可能会退去，进而形成一种“文化心理学”，并主张我们借助一个更具历史意义、更能说明问题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的文化成果。

我们至今仍然从很久以前的前实证主义者那里汲取丰富的营养：乔姆斯基（Chomsky）毫不掩饰他对笛卡尔（Descartes）的崇拜，皮亚杰（Piaget）离开康德（Kant）就寸步难行，维果茨基（Vygotsky）则不能没有黑格尔（Hegel）和马克思（Marx）的指导。高聳的“学习理论”之峰也是建立在约翰·洛克（John Locke）铺就的理论基础之上。弗洛伊德（Freud）的后继者们虽然摆脱了“生物能学”模型的羁绊，也只是突破了其理论最浅显的部分，心理分析可能继续在原有的理论上成长，新近的认知革命如果没有当时哲学环境的支撑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即使有人突破了“正统”心理学的界限，注意到人文科学的其他姊妹学科，也会对本世纪提出的经典问题再度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些问题由继19世纪的冯特在莱比锡创立心理实验室之后的尼采（Nietzsche）和皮尔茨（Peirce）、奥斯丁（Austin）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雅格森（Jakobson）和德·索

绪尔 (de Saussure)、胡塞尔 (Husserl) 和卡西尔 (Cassirer)、福柯 (Foucault) 和塞尔 (Searle) 等提出。

毫不奇怪, 困扰心理学的狭隘和“封闭”正在受到抵制。广大知识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的期刊不屑一顾, 这些期刊似乎主要是面向外行人, 并仅停留在对琐碎问题的研究上面, 每期仅列举一些无足重轻的研究项目。心理学学者们对我们的学科现状以及对其新的重组方式的探索有一种担忧和不安。尽管人们对“短小精悍的研究项目”和曾经被戈登·奥尔波特 (Gordon Allport) 称之为方法论的东西反响强烈, 但是心理学的主要问题还是被再度提出——关于心智的本质和形成过程的问题, 关于我们怎样构造意义和本体的方法问题, 关于心智在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构成的问题。

相对于内在的“正统”心理学, 这些问题通常更侧重于探索外围世界, 并且正在借助某种微妙的力量进行自我整合, 而这种微妙的力量激发了许多内涵丰富的答案。现在, 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大比较》(Great Comparisons) 一书中的方案, 这些方案一直在挑战心理学: 人类与其进化祖先之间的比较; 尚未成熟的孩子与完全成熟的成人之间的比较; 完全健康的人与受精神疾病或孤僻症困扰的人之间的比较; 不同文化中的“人性”之间的比较, 实际上甚至还包括有血有肉的人与模仿人的机器之间的比较。随着关于心智、意识状态、意义、本体构造、精神原则、文化形式等禁忌话题的提出, 人们开始热衷于对这些领域的探索。奥克姆 (Occam) 的“剃刀原则”告诫我们不要搬弄那些不“必要”的概念, 头脑中一定不要抛开精神科学。约翰·斯图尔特·米尔 (John Stuart Mill) 提出的要消灭一切求知欲的演绎原则也没能拯救那些可能满足于可控实验的人们。

本书以当今的心理学为背景, 并考虑到它混乱、脱节和新的简化现象, 我将其称为《有意义的行为》是为了强调它的主题: 即意义构成的本质和文化结构, 及其在人类行动中所处的核心位置。我写的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通自传性质的遁词, 尽管读者很快就会发现

它“反映了”我长期作为一名心理学家的经历。所有的独立见解都是从对话中提炼出来的，就像巴赫金（Bakhtin）教导我们的那样。我长期参与旨在构造和改革心理学的对话，这是一大笔丰厚的财富。我在以下各章中的言论反映了我对当今这类对话的观点。

这不是说要对意义构造过程的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那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更确切地说，心理学自身要专注于研究意义，并努力阐释此时心理学的状态，阐明它会怎样不可避免地变为文化心理学的过程，并说明它会怎样必然地突破实证主义科学的传统目标，而以简化论、因果性解释和预测为理想。这三者不需要刻意地兼顾，因为当我们探索意义和文化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另外一个对象。要把意义和文化归结到物质基础，比如说它们“依靠”左半脑，就意味着不重视“错置具体性”的作用。坚持单纯地从“诱因”方面进行解释，就会妨碍我们把握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以及我们对人类的理解行为的理解。如果我们将心理学的客体（有关任何理智的进取心）作为理解的成就，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要提前理解所观察到的现象——预测又意味着什么呢？似是而非的理解不是更倾向于因果性解释吗？特别是当因果性解释的成果迫使我们人为地以几乎超越认知的研究内容代替人类生活的时候更是如此。

对人类心灵的研究是如此艰难，研究在客体和替代物两者之间是如此地摇摆不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动用昔日物理学中的思维方式探索。具体而言，这件任务异常重要，需要我们将各种深入的见解用于分析理解人类对世界、对其他人及其自身的看法，这也是我们应该秉承的精神。

鸣 谢

我不能一开始就罗列策划这本书的所有人和机构。从很多方面说，本书不仅代表着当前我本人的大部分想法，似乎还代表着某种“被压抑观点的回归”。因为，我受到的某些影响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如在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的那段时间，我从20世纪中期开始在那里呆了10年，在此期间我深受克莱德·克拉克弘（Clyde Kluckhohn）和戈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特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亨利·默瑞（Henry Murray）的启发并受益匪浅。该系有一个目标，我们每月都要聚在一起开一次研讨会，阐述那个目标：即怎样协调两类观点之间的关系，一类是作为一个独特个体的人的各种观点，另一类是那些作为文化和生物有机体的表达的观点。那些在每个星期三晚上讨论的内容将在后面的文字中有所反映。

还有“社会科学八论”（Soc Sci8）及“人”的概念，在这些方面，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和我试图说服一代哈佛人和雷德克利夫（Radcliffe）式的大学生们：要想了解一个人，你必须把他放到动物王国（他从那里进化而来）的背景中去审视，而且要联系文化和语言，因为这两者构成了他赖以生存的符号世界，还要考虑到将这两股强大的力量糅合在一起的发展过程。但我们不久后确信，心

有意义的行为

理学光靠自己不能完成该任务。所以，我们建立起一门属于我们自己的跨学科人文科学——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该学科开设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具体讲授时间是从每年的9月到次年的5月，我们努力保持领先我们的学生一步。

在这期间，认知研究中心成立了，我们将在本书的开篇第一章中更多地谈到它。我在这里提及它只是为了向另外一个团体致意，这个团体促使我确信划分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和哲学等领域的界限是为了方便行政管理而不是因为知识方面的原因。

另外，还有那些长期的交流伙伴：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大卫·克莱屈（David Krech）、亚历山大·鲁利亚等。

早期有几位朋友读了本书的手稿，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他们是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罗伯特·立夫顿（Robert Lifton）、丹尼尔·罗宾逊（Daniel Robinson）和唐纳德·斯宾塞（Donald Spence）。我对他们的帮助表示由衷地感激。

我特别要感谢在耶路撒冷接待我的人们。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阿姆诺·帕兹（Amnon Pazi）校长、莱克特·约莱姆·本·普拉茨（Rector Yoram Ben—Porath）、史密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教授和理艾德·梅伯格（Liat Mayberg）女士。我在耶路撒冷的讲座内容构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我很少面对那么投入、那么精明的听众，他们在12月的午后聚集在斯克帕斯山上听我演讲，他们的评议和提问促使我对讲稿作了卓有成效的修改。我也很感激斯宾塞基金（Spencer Foundation）给予我的资金支持，这是我完成本书的基础。

最后，我要表达对出版人亚瑟·罗森塔尔（Arthur Rosenthal）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该出版社的其他人：安吉拉·冯德利（Angela von der Lippe）总是巧妙地鼓励我；卡利·史密斯（Calille Smith）是一位极具耐心和想象力的书稿编辑。

仅将此书献给卡罗尔·费舍尔·弗里德曼（Carol Fleisher Feldman）、我的妻子和同事。它将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悄然面世。

目 录

前言 1

鸣谢 1

第一章 人文研究 1

第二章 作为文化工具的通俗心理学 32

第三章 意义剖析 67

第四章 自传和自我 99

第一章 人文研究



我想从认知革命说起，这场革命在经历了客观主义的寒冬之后，试图将“心灵”带回人类科学领域。但是，我的学说不是简单地描述这一勇往直前的历程。^①因为至少在我们看来，这场革命现在已转变为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当初催生它们的推动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认知科学已经被技术化了，甚至于被削弱了当初的推动力。这并不是说它失败了：恰恰相反，因为认知科学注定是学术交易所中成长最快的股票之一，它可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这种胜利是在付出高昂的技术成本后获得的。有些批评人士——甚至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新的认知科学作为这场革命的产物，已经取得了技术上的胜利，付出的代价是让心灵这个概念失去人性化。而它一直追求的就是重新确立心灵在心理学中的地位，因此，它使心理学中的许多内容与其他人类科学和人文科学分离开来。^②

我将进一步简短地阐述这些问题。但在此之前，我要为您列出本章以及后面几章的计划。当我们回顾完那场认知革命后，接着会对即将再度兴起的革命进行初步的探索。这场革命更倾向于解释与“意义构成”相关的认知，它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已扩展进入人类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理论、心理学的领域中，时下，差不多在所有领域都能看到它的影子。^③我甚至怀疑如此强劲的发展可能会重

有意义的行为

拾当初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势头。我将在后面几章里对某些研究进行初步但具体的阐述，这些研究以心理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中邻近学科之间的界限为目标，而且具有当初认知革命的那股发展势头。

现在，先让我来阐述我和我的朋友们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生的那场革命的想法吧。我们认为，它试图竭尽全力将意义确定为心理学的核心概念——不是刺激和反应，不是明显可能观察到的行为，也不是动物本能及其转变，而是意义。它不是一场反对行为主义的革命，其目标也不是通过往行为主义中加入一点心灵主义使之成为更好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爱德华·托尔曼（Edward Tolman）曾经那样做过，但收效甚微。^④那场革命要比这深刻得多，它的目标是发现并正式地描述人类与周围世界交流时所产生的意义，进而提出与意义生成过程相关的假设。它关注人类在描述和理解整个世界和他们自身时所进行的符号行为，其目标在于加速推动心理学与其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辅助性姊妹学科携手发展。实际上，表面上认知科学日益计算机化，但以上所说才是真正的事实——起初是缓慢推进，现在其动能不断增强。所以，如今人们发现文化心理学、认知和解释人类学、认知语言学等研究中心一派繁荣。总之，自从康德关于心灵和语言的哲学出现之后，这一领域就一直保持着旺盛的进取性。它很可能成为时代性标志，代表人物是1989-1990年在耶路撒冷—哈佛联合讲座的主讲者们，他们有着各自的方式和传统——格尔茨（Geertz）教授在人类学领域独树一帜，而我在心理学领域也有着自己的独立见解。

正如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认知革命从本质上要求心理学与人类学和语言学、哲学和历史，甚至于法律学形成合力。所以，在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gnitive Studies at Harvard）成立的初期，组成人员中有一位哲学家奎恩（W.V. Quine），一位睿智的

历史学家斯图尔特·休斯 (H. Stuart Hughes) 和一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这毫不奇怪，也绝非偶然。或者说，中心内的哲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其中还有诸如纳尔逊·古德曼 (Nelson Goodman) 等新构造主义的倡导者——在数量上与心理学家不相伯仲。至于法律学方面的代表，我必须说明，该中心的几位著名法律学专家只是偶尔参加我们的座谈会。他们当中的鲍尔·弗莱德 (Paul Freund) 承认是因为我的缘故才来到中心，他所感兴趣的是，规则（比如语法规则，但不包括科学公式）如何影响人类的行动，以及法学究竟需要研究什么。^⑤

我想现在应该向您说明，我们不是要站出来“改造”行为主义，而是要替换它。正如我的同事在随后几年里说的那样，“我们将我们的新信条钉在门上，而后就等待着，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一切都很顺利，事实上是非常地顺利，以至于最终我们可能是白白地为我们能否取得成功担心了那么久。”^⑥

如果写一篇关于上个世纪后四分之一时期的学术史的论文，追述认知革命的原动力以及它分裂、技术化的过程，肯定会引人入胜。完整的故事最好交给那些睿智的历史学家去写。现在，我们需要弄清的是沿途的标志牌，它们已足以为我们指明即将前往的知识领域内的情况了。比如，很早之前，研究重心就从“意义”转向“信息”，从意义的构成转向信息的处理，这些都是影响深刻的变化。这一转折中的关键要素是计算作为主要的隐喻方法而被引入，以及可量化计算成为好的理论模型的基本标准。信息与意义的关系不大，从计算的角度来说，信息由系统中未进行编码的信息要点组成，而意义要经过归纳才能成为信息要点，它既不是计算的结果，跟随机分配式的计算存储也没有关系。

信息处理是指根据中央控制单元的指令，在存储地址上记录或获取信息要点，或将其暂时存在缓冲存储器上，然后按照指定的方

有意义的行为

式操作：列表、命令、组合、对比未编码的信息。完成所有这些工作的系统对其存储的是莎士比亚诗歌中的文字还是随机数据表中的数字均一无所知。根据典型的信息理论，如果一个信息要点减少了可能的选择性就具有情报价值。这就暗含着一个锁定某种选择的代码，可能性序列和它们包含的例证要按照系统中的“语法规则”——可能出现的变化情况——进行处理。到目前为止，这一分配系统中的信息仅能处理字典层面上的意义：根据经过编码的地址评估存储的词汇信息。还有其他“类似意义”的操作，如改变一系列条目的序列，以便按照标准测定其效果，就像在拼字游戏或字谜游戏中那样。但信息处理不能应对既定范围之外的任何东西，对于那些能够随机进入特定关系的条目也无能为力，这种特定关系被基本操作程序严格控制。这样的系统不能处理模糊的、存在分歧的、隐喻的或内在的联系，如果非要它这么做，就好比让一只猴子进入了大英博物馆。它只能机械刻板地按运算法则来解决问题，或冒险去试探不确定性。信息处理需要提前规划并拥有准确的规则。^⑦它排除了类似不严谨的问题：如“穆斯林正统派人士头脑中的世界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或“自我概念在希腊荷马时代和在后工业时代有什么不同？”它倾向于解释类似这样的问题：“按照怎样的最优战略为操作者提供控制信息，才能确保车辆在预定轨道上行进？”我们接下来将进一步探讨意义及其产生过程，它们与传统上所谓的“信息处理”距离之远让人惊讶。

后工业时代的信息革命早已遍及全世界，因此出现这样的论断毫不奇怪。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通常都是很敏感的，它们对其所处社会的需要经常是过于敏感。理论心理学总是本能地按照新的社会需要去重新定义人及其心灵的涵义，在这样的条件下，研究者的兴趣相应地从心灵和意义领域转向计算机和信息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计算机和计算机理论基本上已成为信息处理

的代名词。先前在一定领域内确定下来的健全的意义分类足以作为操作代码提供一个基础，因而装有适当程序的计算机就可以进行一些最低限度的操作进而完成信息处理，从此计算机应用技术有了用武之地。不久，计算成为心灵的范式，并取代了意义的概念，新的概念——“可计算性”出现了。认知过程与那些可在计算装置中运行的程序等同起来，比如说，一个人在“理解”上的成功，如记忆或概念获得，实际上成为了人们用计算机程序来模仿人类形成概念或记忆的能力。^⑧这一思考方法得到有开创性深刻见解的图灵（Turing）的大力佐证，他认为：任何计算机程序，无论它有多么复杂，都是“仿照”极为简单的普适图灵机（Universal Turing Machine）的功能，依靠一组原始的简单操作来完成工作。如果有人习惯于将那些复杂的程序看成是“模拟的心灵”——借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那么他再往前迈出关键的一小步，就会完全相信“真实心灵”及其形成过程同模拟的心灵及其形成过程是类似的，均可以按照相同的方式来“解释”。^⑨

新的简化论为正在生成的新认知科学提供了一个惊人的自由论程序，它非常之宽泛。实际上，哪怕是早期的刺激—反应学习理论者和研究记忆的联想论学者，只要他们将自己的旧概念用信息处理的术语包装一下，就都能回到认知革命的阵营，这与“精神”过程和意义毫不相干。取代刺激和反应的是输入和输出，情感污点被转化成一种控制元素，而控制元素将操作结果的信息反馈给系统，进而使对情感污点的清洗得到强化。因此，只要有可用于计算的程序，“心灵”的概念就可以产生。

起初，关于“心灵”的双关提法似乎并没有在那些看似已转变为行为主义者的传统反精神第一论者中引起恐慌。然而，原以为人们所熟知的经典论战很快以新的形式重新展开，特别是对与所谓的认知建构相关理论的讨论：它被视为一组在接受、拒绝、输入信息

有意义的行为

组合等方面类似语法等级的嵌套规则结构，还是被视为一张自下而上的完全可以进行分布式控制的——就像在PDP（并行分布式处理）模型中那样——连通主义网络，PDP模型很像是去掉赫尔巴特（Herbart）创造性假设后的联想论者思想。第一种提法在心理学方面，模仿了自上而下的理性主义—精神第一论者的传统做法，在“真正”的心灵和“模拟”的心灵之间轻松地荡来荡去；第二种提法是曾被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嘲笑为“尘碗经验主义”的翻版。东海岸的计算机主义者将此类接近心灵的术语表述为“规则”、“语法”等，而西海岸的学者们则不想卷入这种模拟的精神第一论之中。不久，论战的竞技场看起来似乎越来越传统，越来越为大家所熟悉，尽管在里面驰骋的车辆速度愈来愈快，而且从形式上看马力愈来愈大，但是它们的驾驭者们不论是探讨心灵还是只讨论计算理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双方都得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时间会告诉我们，提出问题者有没有自信，腐朽能不能化为神奇。^⑩

随着计算成为新认知科学的代名词，计算能力成为该新兴科学领域内衡量理论是否有效的必要（或许还不够充足）标准，所以对于精神第一论的不安与担忧不可避免地要死灰复燃。若将心灵等同于程序，意识应如何表述？（老式的意识表述中从未呈现出计算机系统程序中的程序特征，而是表现为主观的表达形式）这类系统中没有“心灵”的位置——“心灵”是主观意识的表现，如相信、希望、打算、掌握某种意义，不久就有人高喊取消这门新科学中的意识表述。显然，即便是在早期行为主义全盛时期出版的书籍，也不能与斯蒂芬·斯蒂奇（Stephen Stich）的《从通俗心理学到认知科学》（From Folk Psychology to Cognitive Science）中蕴含的热情相匹敌。^⑪一定有政治家式的人物从中周旋，才维持了守旧的、主张精神第一的认知论者与勇敢的新兴反精神第一论者之间的和平局面，但是他们对精神第一论者采取的形式不是迎合就是哄骗。比如，丹尼特（Den-

nett) 提出, 我们行动的前提应该是人们的意识能够导致他们以某些特定的方式做出行为, 而后我们会发现根本不需要这类模糊的概念。^⑫ 保罗·丘奇兰德 (Paul Churchland) 勉强地承认, 人们为什么紧紧地抓住自己那很显然是错误的精神第一论思想不放——这个问题颇为耐人寻味, 有些细节还有待解释, 而不能想当然地就认为应该如此。或许, 正如丘奇兰德 (Churchland) 所说, 通俗心理学似乎是在描述事物的真正过程如何。但是信念、希望或态度怎样促使物质世界——也就是说, 计算中的世界中一切事物发生的呢?^⑬ 在这种情况下主观意识上的心灵或者是计算机系统在一定条件下附带产生的现象不会成为任何事物的产生缘由; 或者仅是人们在行为发生 (也是一种产出) 后谈论行为的一种方式, 这时它已不仅是一种行为, 还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深入的语言学分析。是的, 我必须得提到杰瑞·福多 (Jerry Fodor) 的先天论 (Nativism): 它也是包含在该系统之中的原生过程的派生物,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一种效果, 而非一种原因。^⑭

随着对意识形态和意向性新一轮批判的展开, 与之相关的对施动概念的批判也出现了。总体说来, 认知科学家在“行为被引导及至被导向目标”这一思想上并无争议。如果是可选择结论的效用计算结果主导了这一导向, 这种状况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实际上, 这正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所在。然而, 处在新阶段的认知科学尽管与目标导向型行为的关系很融洽, 但对于施动概念仍然是很谨慎, “施动”意味着行动要在意识支配下展开。基于信念、期望和道德约定的行动, 现在被看成是正直的认知科学家所回避的东西, 这就像决定论者的自由意志。^⑮ 有些人勇敢地坚持反对新的意向主义, 如哲学家约翰·塞尔 (John Searle) 和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心理学家肯尼思·格雷 (Kenneth Gergen)、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 (Clifford Geertz), 但他们的观点被主流计算主义者中